

艺术的征程

华雷武 旧事重提

胡朋 我的演艺生涯

黄佐临 戏坛漫步

欧阳山尊 延安精神与艺术生涯

汪洋 浅谈我的艺术创作之路

彦克 我与革命文艺的不解之缘

于蓝 愿为艺术事业献身

草明 我的文学道路

柯岩 我的文学之路

林默涵 往事悠悠

刘白羽 战士的胸襟 浪漫的创作

乔明 人生最贵平常心

汪曾祺 心地明净无杂质

叶君健 我的文学创作、翻译生涯

陈紫 踏上革命文艺的征程

华雷武 旧事重提

胡朋 我的演艺生涯

黄佐临 戏坛漫步

欧阳山尊 延安精神与艺术生涯

汪洋 浅谈我的艺术创作之路

彦克 我与革命文艺的不解之缘

于蓝 愿为艺术事业献身

草明 我的文学道路

柯岩 我的文学之路

林默涵 往事悠悠

刘白羽 战士的胸襟 浪漫的创作

乔明 人生最贵平常心

汪曾祺 心地明净无杂质

叶君健 我的文学创作、翻译生涯

名家

口述中国文艺

主编 廉静
副主编 陆华 郭锦华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陈紫 踏上革命文艺的征程

华君武 旧事重提

胡朋 我的演艺生涯

黄佐临 戏坛漫步

欧阳山尊 延安精神与艺术生涯

汪洋 浅谈我的艺术创作之路

彦克 我与革命文艺的不解之缘

于蓝 愿为艺术事业献身

草明 我的文学道路

柯岩 我的文学之路

林默涵 往事悠思

刘白羽 战士的胸襟 浪漫的创作

乔羽 人生最贵平常心

汪曾祺 心地明净无杂质

叶君健 我的文学创作、翻译生涯

陈紫 踏上革命文艺的征程

华君武 旧事重提

胡朋 我的演艺生涯

黄佐临 戏坛漫步

欧阳山尊 延安精神与艺术生涯

汪洋 浅谈我的艺术创作之路

彦克 我与革命文艺的不解之缘

于蓝 愿为艺术事业献身

草明 我的文学道路

柯岩 我的文学之路

林默涵 往事悠思

刘白羽 战士的胸襟 浪漫的创作

乔羽 人生最贵平常心

汪曾祺 心地明净无杂质

叶君健 我的文学创作、翻译生涯

K825.7/85

2007

名家

口述中国文艺

主编 廉静
副主编 陆华 郭锦华

北方工业大学图书馆



C00051185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名家口述中国文艺/廉静主编.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7. 6

ISBN 978 - 7 - 5039 - 3323 - 3

I. 名… II. 廉… III. 文艺—中国—文集 IV. I2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81661 号

名家口述中国文艺

主 编 廉 静

副 主 编 陆 华 郭锦华

责任编辑 胡 晋

责任校对 方玉菊

封面设计 大鹏工作室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

网 址 www.whyschs.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 64813345 64813346 (总编室)

(010) 64813384 64813385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7 年 7 月第 1 版

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0.5

字 数 28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 - 7 - 5039 - 3323 - 3/I · 1542

定 价 1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印装错误，随时调换。

序

黎 辛

这部书是《百位文艺家口述资料抢救整理与研究》科研成果的一部分，共收录了其中15位文艺家口述。

这些文艺家，无论在抗日民主根据地、国民党统治区或日寇占领区以及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是在学习和实践毛泽东文艺思想方面做出成绩的。他们的文艺作品在当时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教育了群众，现在仍具有现实意义。林默涵是文艺理论家，他说工作需要他写什么就写什么，需要他干什么就干什么，这是有代表性的。

解放区的作家深入生活有方便的条件，草明几十年去过好多个工厂，“参加实际工作，了解工人生活、生产与内心世界”，被称为反映现当代工人生活的“经典作家”。

在延安，毛泽东与文艺家接触最多，草明回忆1942年4月11日她与欧阳山应邀与毛泽东谈话，她说，欧阳山讲一段，毛主席讲一段；欧阳山又讲一段，毛主席又讲一段。毛主席不仅仅专心听人讲话，尊重对方，而且分析他人的观点，并立即做出自己的反应。草明又说：“我觉得这次谈话很好，使我认识到了工农兵中去，既可以改造思想，又可以消灭宗派主义，又可以有创作源泉，一举多得。”

欧阳山尊生动地描述了他与毛泽东打乒乓球的情景，他知道毛泽东工作忙碌，医生希望他多活动活动，欧阳山尊故意把球抽得很远，让毛泽东跑去捡球，毛泽东发现了他的“阴谋”，也“啪”的一下子把球抽得很远，然后哈哈大笑地说：“这回你也该捡捡球了，我报复

报复。”

书中也有文艺家回忆与周恩来、朱德、陈云、彭德怀等老一辈革命家接触的；还有人回忆与各根据地领导人接触的鲜为人知的事例。那个年代上下一致，都按毛泽东 1936 年在保安说的“我们不但要武的，我们也要文的了”去做，重视、关心文艺，使文艺发挥了空前的巨大作用。

许多文艺家谈到个人文艺经历时，往往深入浅出地把实践中的体会和感性认识提高到理论高度。也有文艺家还谦虚地谈了个人的不足，华君武说：“我自己画人像是画不好的，因为我没有经过美术学院严格的素描训练”。“人家叫我自己画我自己的漫画像时，我就画我双手捂脸的漫画像，因为我的脸捂起来了，就不用画脸了”。他还总结出：“画兽难画狗，画人难画手，脸比手更难，一捂遮百丑。”

还有诗人作家谈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柯岩说：我是坚决拥护反“左”的，但是反“左”应该用什么来反，应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用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来反“左”，不要以左反“左”，也不要以右反“左”，更不要以资产阶级自由化否定革命的一切，泼脏水不能把孩子一起泼掉。文艺家们的口述说明了许多至理忠言。

口述者谈个人的经历，自然地联系到他们所在的许多文艺机关团体与相关的活动，从中读者可以看到更大的文艺天地，特别是可以看到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前后、文艺整风与延安文艺大繁荣情况，以及文艺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与社会主义建设中发生的巨大作用。同时，可以了解到延安时期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鲁艺、边区文协三大文艺组织及其他一些文艺机关团体的情况。由此可见，文艺队伍在革命队伍中的重要地位。

口述者经历丰富，许多事件是首次披露的，许多精彩片断与生动情节是正史中没有记载的，可以弥补中国解放区文艺史、抗战文艺史和延安文艺史史料的不足。

在口述文章的前后，附有每位文艺家的简历与主要作品目录，可以帮助读者对口述者有更多的认识。整理研究者是花了心血的。

总之，这项科研成果，内容丰富多彩，思想先进与解放，理论联系实际，对研究现当代文艺家的创作与活动和现当代文艺历史都有借鉴作用。

2007 年 5 月 1 日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原副院长）

目录

序	黎 辛/1
---------	-------

艺术家口述

踏上革命文艺的征程	陈紫口述 陆华整理/3
旧事重提	华君武口述 董馨整理/55
我的演艺生涯	胡朋口述 方敏 胡月平整理/69
戏坛漫步	黄佐临口述 李世涛整理/90
延安精神与艺术生涯	欧阳山尊口述 郭锦华整理/97
浅谈艺术创作之路	汪洋口述 胡月平整理/129
我与革命文艺的不解之缘	彦克口述 郭锦华整理/136
愿为艺术事业献身	于蓝口述 董馨整理/167

作家口述

我的文学道路	草明口述	程惠哲整理/187
我的文学之路	柯岩口述	陆华整理/212
往事悠悠	林默涵口述	陆华整理/243
战士的胸襟 浪漫的创作	刘白羽口述	杨劫整理/266
人生最贵平常心	乔羽口述	董馨整理/286
心地明净无杂质	汪曾祺口述	杨劫整理/306
我的文学创作、翻译生涯	叶君健口述	郭锦华整理/317
后记		/326

艺术家口述

踏上革命文艺的征程

陈紫口述 陆华整理

陈紫（1919—1999）原名陈先逸，字子述，曾用名陈子树，广东惠阳人；著名作曲家。曾任中国歌剧院副院长，中国音协理事、创作委员会常委，歌剧研究会主席团成员。少年时代在北京、上海度过。1935年起在北京参加“一二·九”、“一二·一六”学生运动，并开始参加党领导下的“民先”组织的抗日救亡运动，1937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音乐系，1938年赴冀中游击区，同年考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1939年考入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成为三期学员。1940年毕业后任“鲁艺”音工团团员，后为音乐研究室研究生。抗战胜利以后，历任东北“鲁艺”音乐系教员，“鲁艺”文工团三团团委、四团演出科长，东北“鲁艺”歌剧团团委兼音乐系作曲教员。解放后还担任过中央戏剧学院歌剧团团委、音乐顾问、歌剧队队长、中央文化部创作组组长等职。

参加学生运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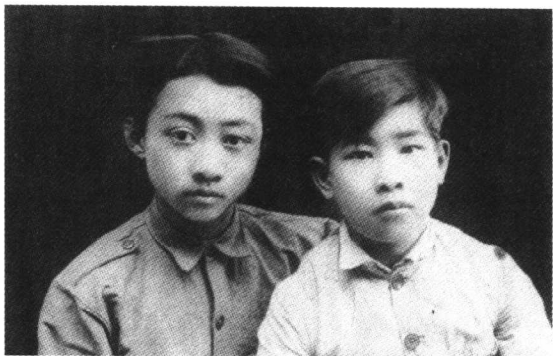
我父亲是康有为的学生、梁启超的同学。他的思想完全是孔孟之道，是保皇党。他觉得民国还不如君主立宪。我父亲在旧中国的法院做事，每次院长一换，他和几个朋友就都跟着院长一起到新的地方上任。

我十四五岁时随父亲从北京到上海赴任。

我在上海的时间只有短短的半年，接触的社会还不是很深。

不久，我父亲又从上海调回天津，还是在法院供职。

在天津我有几个月没有念书，当时正是初中三年级，功课荒废了，



1933年陈紫（右）在北京与小学同学合影

我哥哥留下给我讲课。我记得那三个月他给我补习了几何的三角函数。11月我父亲还没回北京，我就先回到北京了，等着寒假过后插班。

我回到北平后没有地方住，我哥在北师大，他那儿一个宿舍里住了三个人，我住不下。我哥哥有一个朋友（后来我们一起参加革命，也是我的朋友）他姓叶，原名叶柄荃，现改叫叶遂，是我哥哥在宏达中学时的同学。他在北大，住在北大沙滩红楼，那儿专门有一个宿舍区，两个人住一个房子。叶遂同宿舍那个同学经常不来，所以我住在他那儿，在那里补习功课准备插班。叶遂同班的同学马大猷（后来任理工学院院长、政协委员）跟他住隔壁，有时叶遂同房的人回来，我就住在马大猷那里，那是1935年，我16岁。

我哥哥他们这一批人都是穷学生，当然也不是很穷，很穷也上不起大学，但是在学生里是穷的。他们跟清华那些贵族学校的学生不能比，那些学生都是西装革履，而我哥哥他们都是布鞋长袍大褂。

我在上海时，觉得那里很乱，一到北京，就觉得这里很安静。北京当时大概不到60万人口，那时也无车马喧嚣。我住在顺朝王府对面能仁胡同，一边是丰盛胡同，一边是砖塔胡同。到了夏天，两排树荫底下的大门楼好纳凉，当时很多人都很喜欢北京，不喜欢上海。

这时正赶上“一二·九”运动。“一二·一六”与“一二·九”只差一个礼拜。北大当时也有学生运动，我不是在校生，但我跟着他们去了。当时学生全都聚在天安门，宋哲元（当时的北京市市长）的大刀队

水龙头都准备好了，城门全都卡了，结果清华、燕京的学生堵在阜城门进不来，北京的学生出不去。宋哲元的军警一下把学生包围了，用水龙头滋。我距离比较远，但我看见他们滋了，把人滋一跟头。也有学生挨打的，学生后来冲破了军警的阻挠，还是汇合了。

我曾经还有照片，那时我实际上是旁观者，跟着队伍走，什么都想看。为什么前边一两次运动我实际上是随大流跟着走呢？因为叶遂不是“民先”的，他和我哥哥都是学理科的，理科的学生都不太关心时事和政治，不像学文学的同学更多地参加政治运动。

1936年3月16日学生又重新集合起来去请愿，这次我参加了。北大学生郭靖请愿被国民党打成重伤，3月14日或是15日死了。学生买了棺材，抬棺游行，一直游行到当时的北京市政府，就是现在的北京市文化局那里，非要宋哲元出来。我记得我们一直坚持到下午5点，最后宋哲元还是出来了，说：“这个事情我们一定要追查，要安排好家属，现在国难当头学生还是读书救国，对抗战救亡的事情政府有安排。”后来我又跟着队伍回到红楼。

这个事件以后，我又参加了几次游行和一次请愿。第二年春天3月份，我插班到位于和平门的中华中学读高中一年级。高中一年级前半年我都没去上课，我在北大卷入到学生运动当中去了。

在“民先”活动中

我上了中华中学以后，“民先”（全名民族解放先锋队，是抗日民主的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后来改名为中国民族解放先锋队）的活动很多。我有两个同学，一个叫童术功后来改叫童诚，一个叫黄岑。他们吸收我参加了“民先”活动。1936年救亡活动比较多，看苏联电影《快乐的人们》，唱救亡歌曲《忍受不自由莫大痛苦》、《你光荣的牺牲了》、《大众歌》、《开路先锋》、《大刀进行曲》，等等。

我们还组织办墙报，我记得有一个姓赵的同学会刻木刻，还刻了高尔基、鲁迅的头像。

我们还组织读书会，看巴比塞《从一个人看一个世界》、看斯诺的《西行漫记》、艾思奇的《哲学讲话》（后来改版为《大众哲学》）、张仲

实的《政治经济学》、邹韬奋办的《生活周刊》等进步书刊。

学生自己组织军训，专门从二十九军请了一个军官教我们学习军事，出操，打靶，练枪。

如果说上海姓李的同学，从思想上启发了我投身到进步学生队伍中，而引导我真正参加学生运动洪流里去的是这两个人：童诚、黄岑。后来也是黄岑他们介绍我到冀中去的。“民先”所有的活动我都参加了，但我记不得我填了“民先”的表没有。童诚死了，黄岑后来打成右派，等他出来不久也死了，所以我一直没有问他。

放暑假前要期中考试了，当时“民先”学生总部传下话来，说国难当头，不要死读书了，不要参加考试。

当时中华中学是“民先”领导控制的一个学校。北京学生运动有两大派：“一二·九”、“一二·一六”运动以后北京学生成立了学生联合会，这是在“左派”领导下的派系；1937年纪念“五四”的时候又成立新学联，这就是蓝衣社，是国民党青年的组织，代表人物是志诚中学校长吴保三，他是北京右倾学生的组织者。北大是“左倾”学生运动的领导，搞得热血沸腾，基本上没怎么上课。学生总部号召罢考，我们搞运动的都罢考了。但是也有一部分平时学习的学生，进考场考试了，于是我们组织了一批人进考场把卷子都收走了，结果没考成。

1936年底张学良要求停止内战，在西安发动事变，活捉了蒋介石。听到这个消息，我们一下子全都活跃起来了，要求抗战，不要上课了。大家都出去游行。后来张学良又把蒋介石放出来了，所有的蓝衣社学生又组织集会游行。我们便在黑板写上：凡是参加游行的都是反动的。

记得当时何应钦到北京，签订所谓“何梅协定”。当时总部马上就通知我们准备游行罢课，反对“何梅协定”。当时有很多这种活动，我们学生里也有一部分人根本就不参加，只是埋头读书，把功课搞得好好的。还有极少的人就是花花公子。我现在还记得有一个姓马的有时给我们讲他怎么嫖妓。正像鲁迅说的，一方面是严肃的工作，一方面是荒淫无耻。确实在同学中都存在。

当时我们要罢课撕考试卷子，可是有人坚持要考试，并不是进步学生一说就跟着跑。我那时比较年轻，当时国家、民族危亡对很多人，包括光读书的人都心有所动，但是功课好的学生不参加这种活动。当时老

罢课，确实功课就不太好。

这时候我开始读一些理论书籍，我先读了巴金的一些书，如《关于虚无运动的史话》，巴金介绍“十二月党人”活动，介绍克罗泡特金的《面包掠夺》的书，屠格涅夫《门槛》等，那时我很佩服十二月党人，佩服无政府主义，觉得要进入门槛就要付出自己的生命来。后来我不仅仅满足这些，于是读了艾思奇的《哲学的讲话》，张仲实的《政治经济学》，到北大、北师大图书馆找马克思的著作，找了半天找了一本《哲学的贫困》。这本书是马克思批判普鲁东的，批判虚无主义的。这本书我狠狠地读了一下，但是读不懂。当时我们喜欢谈谈哲学，谈谈人生观。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虽然年轻很幼稚，但热情很高。记得有一次通知看苏联电影，看着看着就让人给掐了，全场都唱起了救亡歌曲，有人还唱起《国际歌》。宪兵马上就来了，包围起来捉人。

那时有一个东北中学，很多东北流亡来的学生都到东北中学去了。有一次我路过，我站在马路对面看见两辆大卡车，十几个宪兵下来扔下来一捆绳子，一下捆出十几个学生拉上车带走了。是蒋介石的宪兵三团干的。蒋介石的宪兵三团是蒋介石的侄子蒋效先领导，吴保三等人都受蒋孝先操纵。当时斗争还是很紧张的，就因为参加了几次这种活动，到了1937年我只好转到华北中学去了，不能继续在中华中学了，但不算开除，属于让我转学的。校方说，下学期你不要再来上课了。到了审干时，关于这个，因为北京当时被占领一直审不清，说我们参加自学社是国民党的反动组织。“文革”时终于有人找到中华中学的一个国文教员姓靳，当时他是中华中学的国民党书记。他证明我不是国民党，属于进步学生。小学时我原名叫陈先逸，到中华中学时我叫陈子树。他说我们让他退学了，实际上把他开除了。

我于1937年春天转到了华北中学。到了华北中学，和我平时联系的人就是黄岑了。日本占领北京以后，我是正式的自学社成员。自学社实际上就是“民先”，当时“民先”不好公开活动了，就改成自学社了。

那时候，风声越来越紧了。华北中学是蓝衣社控制的，没有进步活动，只有上课。有半年我基本上没有参加什么社会活动，只有在底下和他们保持着联系，看进步书籍，订《生活》杂志，有时参加读书会。

到了华北中学以后，整个气氛都变了，大家不谈政治。虽然华北中



1937年陈紫与将去美国留学的朋友在北京合影

学不是相当反动的学校，但是跟中华中学大不相同，那里搞得热火朝天，可这里平静如水，该上课的上课，该打网球的打网球，该练体操的练体操。

于是我又开始坐下来读书，不仅读哲学，还读了一些小说如《美国的悲剧》、莫泊桑的短篇等。

在华北中学我认识了一个朋友姓刘，他给我介绍了一些文学书籍（解放后他在《新观察》当编辑），介绍我看了很多书，特别是屠格涅夫的《父与子》、《前夜》、《贵族之家》、《烟》以及一些短篇。他是向我介绍巴金书的第二

人，也相信虚无主义。他还给我介绍了北欧的剧本《夜未央》。

《夜未央》描写北欧的十二月党人活动。十二月党人经常在一个咖啡馆见面，咖啡馆跑堂的叫哑喉咙。很多人都说准备回去刺杀沙皇。主人公在这里爱上了一个女的叫维娜。维娜跟他很好，他对维娜表示爱情，但是维娜没有回答他。他们一起逛街，走到教堂时钟声响了，她说：“我该回去了。”临走时她告诉他：“我早知道你爱我，但是我没有权利爱你，因为我不属于我个人。我明天就要回俄国了，而且肯定不会活着回来了，我们这是最后一次见面了。我跟你说明白了，我们不可能。”然后忽然抱着男的拼命吻，吻了以后推开男的走进咖啡馆。他就敲咖啡馆的门，门开了，哑喉咙出来了，他说：“你找谁？”他说：“我找维娜。”他说：“你找维娜？叫维娜的人太多了，匈牙利有很多维娜，俄罗斯都是维娜。你要找哪个维娜？”他说：“我无论如何也要见她。”他说：“你没有权利见她，她已经回俄国去了。”过了两天他看见报上登了一个女的刺杀沙皇

未成被处死刑。他一打听就是维娜，痛苦极了。维娜的事被写成一个剧到处演。最后他还是结婚了，和一个演维娜的女演员。她演得特别像，他觉得这个女演员就是维娜。

我看了这本书也很激动，特别是那些话：“你没有权利，她不是你一个人的，她是俄罗斯的，她是革命的。”这些话对我也是燃烧，影响很强烈，觉得要献身革命就要牺牲自己。80年代我看了电影《十二月党人》上下集，感动极了，好像一下子又回到了学生时代，充满了那时的感情，把所有的过去都回忆起来了。

1937年5月4日，纪念五四运动，黄岑通知我到师范大学开会，并说，听说新学联也要去，叫我们都去。我跟着他们一块儿去了。新学联和旧学联同时在北师大体育场搭台子。旧学联是共产党领导的，新学联是国民党领导的。两边抢话筒，旧学联说要抗战到底，停止内战。新学联就说到最后关头不轻言牺牲，现在政府有统一部署，不要打乱了蒋委员长的部署。我们就说，他们是投降派。吴保三还带了童子军来，他们都带着棍子，最后新旧学联打起来了，抄了教室的好多长板凳，我们旧学联的拿着板凳跟他们打，打伤了不少人，会场乱套了。警察来干涉，也没结果。大概蒋南翔、李昌也去参加了。

虽然我在华北中学时整个学潮比较低沉，但我还是在那种环境下读了一些书，不仅仅是屠格涅夫的书。屠格涅夫的书我是比较喜欢的，我觉得巴金的一些思想和屠格涅夫是连着的。

冯牧是最老最老的朋友，他说：“我们一起这么久，我总觉得你还是有些虚无主义的倾向。”他这话可能有道理，因为我正好年轻时受这种影响很深，有些东西触类旁通，比如《红楼梦》，虽然它不是虚无主义，但是最后它那里面“好”啊，“了”啊，“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啊，这种空虚的东西有时在我心里会出来。我自己一生的各种遭遇，有时也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悲哀、失落。

学生时代我是一个腼腆的人，当我从最痛苦中解脱出来的时候，我忽然觉得什么都无所谓了，后来就形成我喜欢跟人说笑话，跟人开玩笑的性格了。1942年以前和1942年以后性格上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